

高增德 丁东 编

世纪学人

自述



他们
构成了一幅
20世纪
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
全景图

他们的心路历程
集中地
浓缩着
民族的精神历程

学者集体的心路
就是民族的心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一卷

高增德 丁东 编

立纪学人自述

费孝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高增德,丁东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2-0555-2

I . 世… II . ①高… ②丁… III . 学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09 号

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

SHIJI XUEREN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07 000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2-0555-2

1·447 定价:1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会科学家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 1888—1936 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卷收有顾颉刚、冯友兰等二十九位学人的自述。

序 言

高增德 丁 东

20 世纪快要结束了。在告别 20 世纪之时，我们把这套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有人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民族的大脑，那么社会人文学者，应该是民族大脑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他们的心路历程，自然集中地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者群体的心路，就是民族的心路。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显学。反思本世纪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的书籍，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就知识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在行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具有反思历史的自觉，认真回顾一百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 21 世纪的进程。

由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方的近代学术碰撞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诞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至 30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学科分类

和相当的研究规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富有活力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堪称一流的研究成果。然而，到 5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在“反右”以后干脆被取消。到了“文革”时期，文、史、哲、经，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喇叭筒，不管是有名无实的学科，还是无名无实的学科，到此已经停止了学术生命。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人文学科才得以起死回生。各学科的重新建设大约开始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大体上已经全面铺开，过去有过的学科又都恢复了，国际上有而中国没有的学科也建立了，甚至一些中国独有的学科也产生出来。然而，比起学科的恢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自信的恢复，大约还要晚十年。老一代学人经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生存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哪还有健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到了 80 年代初，心态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下子找不回当年的学术自信 and 风采。中年一代的学者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想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身体力行。内伤的深重，使中国社会人文学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才重新与曾经有过的学术传统接轨，同时敞开怀抱，呼吸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八面来风，使得社会人文学术重新走向兴盛。收入本书的二百位学者自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曲折的发展轨迹和坎坷的奋斗历程。

本书的启动，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底。当时高增德筹备创办《晋阳学刊》杂志，设计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

栏，向健在的老年学者约组自传，同时也请学生和亲属为先哲立传。当时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史料。那些成名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学者，一部分没有熬过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早地辞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乃至过了耄耋之年。请他们留下第一手的叙述，成了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年老体弱，已经不能执笔，只好口授整理。有的学者刚刚写完自述，就驾鹤西去。这二百位传主，一半以上已然作古。这些自述的成稿年代不一，其中有一部分完成于 80 年代初期，当时有的传主经过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学术自信。如果晚几年写，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解放。然而，自然规律又不容许我们等待。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免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大病初愈的特点。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如意，但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一些学者心态逐渐开放，后来撰写的自述，就不只具有史料性，同时具有现实的思想性了。因为是自传和他传同时组稿，有些重要的学者，当时有他人为之作传，所以没有约写自传；因为本书纯属民间行为，有些重要的学者，没有联系上。这些缺欠，只好等本书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或增编续集的机会时来弥补。

本书的编排，以传主的年龄为序，而不按传主从事的专业分类，主要不是因为有些传主跨越几个专业，不好分类，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一种历史感。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末，亲身感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是第一代；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二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是第二代；出生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学术活动的是第三代。虽然每位学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同代人的命运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聪明才

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本书的传主，以第二代为多。而一些第一代的学者自述，当时没有抢救得到，不免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些自述，对于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价值。本书的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这些学者还叙述了求学的经历，早期的讲到旧式的私塾和本世纪最早的新式学堂，一些人讲到留学的经历，许多学者还有执教的经历，这是教育史方面的价值；其中一些学者参加本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思想论争，有的还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回忆，为思想史留下了重要的证言，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学人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也曾在全能政治的环境中，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角色，这些自述，反映了学者阶层的命运变化，这是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最近几年出版的学者传记、年谱或评传日渐其多，但我们还是感到自传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自传、日记、书信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但毕竟是其他研究工作的原始依据。没有原始材料做基础，其他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格外看中自述价值的理由。书中多数自述附有著述目录，均按原貌刊印，未求格式统一。

这些文稿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周折。80 年代初，就有一家出版社与高增德合作开展这项学术工程。先是面对僵化思想的禁锢，审稿每每遇到阻力，后来又面对市场压力，严肃纯正的学术书籍印数骤减，再加上当时经验不足，过于相信君子协

定，该出版社易人毁约，使这项学术工程半途而废。多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慧眼识珠，诸位编辑鼎力推动，使得这套《世纪学人自述》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虽经努力，我们至今尚未与一些作者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或家属尽快将通讯地址告诉出版社，以便奉寄稿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感谢那些提供自述的学者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宥。对于一百多位故世的传主，我们只能追怀他们的成就与业绩，把他们的告白传诸后人，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目 录

- | | |
|---------|-------|
| 【 1 】 | 陈中凡自述 |
| 【 9 】 | 顾颉刚自述 |
| 【 77 】 | 郭绍虞自述 |
| 【 80 】 | 冯友兰自述 |
| 【 87 】 | 郑逸梅自述 |
| 【 99 】 | 马非百自述 |
| 【 140 】 | 高觉敷自述 |
| 【 148 】 | 罗炳之自述 |
| 【 157 】 | 朱东润自述 |
| 【 167 】 | 于省吾自述 |
| 【 177 】 | 赵迺抃自述 |
| 【 202 】 | 潘 菽自述 |
| 【 220 】 | 段熙仲自述 |
| 【 229 】 | 容肇祖自述 |
| 【 244 】 | 周予同自述 |
| 【 253 】 | 言心哲自述 |
| 【 264 】 | 陈科美自述 |
| 【 278 】 | 周谷城自述 |
| 【 281 】 | 童润之自述 |
| 【 293 】 | 诸祖耿自述 |

【 319 】	钱南扬自述
【 324 】	夏承焘自述
【 338 】	高 亨自述
【 342 】	洪心衡自述
【 346 】	周传儒自述
【 362 】	陈岱孙自述
【 374 】	唐圭璋自述
【 381 】	谢国桢自述
【 390 】	吴文藻自述
【 412 】	索 引



陈中凡自述

我名陈中凡，原名钟凡，字觉元，别号斟玄。江苏建湖人。1888年9月29日生。回忆儿时曾在家乡入私塾多年。1903年进镇江承志学校读书。次年转淮安中学堂，后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就读。在南京时，周末常在金陵刻经处听讲佛学，遂引起对哲学的兴趣。

1912年，我在沪江大学补习英文。一年后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信仰蔡元培的自由主义，偏于唯心学派。1917年任北大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1918年2月至1919年7月，任北大附设之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在北大任职期间，曾加入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该会主张“六不主义”，第一是“不做官”，从此养成“超政治”的思想。1918年8月至1919年7月，曾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教员。当时，广大学生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潮。我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陈宝镗、马骏、许德珩诸君一道，担任了学生救国会于1919年1月出版的刊物《国民杂志》的编委，积极开展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的宣传。由于我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因此被女高师解聘。同年8月至1921年7月，由新校长毛邦伟介绍，重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兼教员。

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

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间，曾于1924年7月，应邀去西安讲学。旅途情况作有《陕西纪游》一文。首云：“民国十有三年夏，国立西北大学及陕西教育厅合组暑期学校，校长傅佩青暨教育厅长马凌甫函聘国学讲席，遂有西安之行。往返凡四十有九日，游踪所及，举凡太华终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广，函谷潼关之险，曩昔所向往者，莫不登临，一览无胜，信足名生平之赏矣。辄述经程，用备省览，斯纪游所由作也。清晖馆主。”（载《西北大学周刊》1924年10月21日）当时，我担任的讲题是：一、中学国文教学法；二、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三、读古书的途径。与我同期应聘前来讲学的约十余人。据西安《旭报》（1924年7月18日）报道，有：王桐令、李干臣、林砺儒（以上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济之（南开大学教授）、柴春霖（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夏元璠（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陈中凡（东南大学教授）、陈定谟（南开大学教授）、周树人（北京大学教授）、梁龙（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广州大学法议院院长）、王凤仪（法国大学法学博士）、蒋廷黻（南开大学教授）、刘文海、吴宓（二人皆东南大学教授）等十四人。另据《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特刊》本校暑期学校讲师及所讲题目一览表内载有：王桐令、刘文海、李济之、蒋廷黻、李干臣、陈定谟、陈中凡、周树人、王来亭（即王凤仪）、夏元璠等十人。暑期学校的活动，在西安《新秦日报》《旭报》以及陕西《建西报》等均有报道。

鲁迅从7月21日至29日为暑期学校讲演《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分六讲，讲了八天共十一次，十二小时，内容精湛，使人得到新的观点和知识，深受学员听众的欢迎。《新秦日报》1924年7月30日有“鲁迅讲演已终”；31日有“听讲

员欢送鲁迅先生”等报道。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我应约写过一篇简短的回忆：《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兹录于此：

1924年7月，我三十五岁，应陕西教育厅及西北大学之约，赴西安讲学。东南大学政治系教授刘静波（文海）同行。乘津浦路车北行，到徐州改乘陇海路车，经商邱、开封、郑州、洛阳到陕州。越日，鲁迅、夏元瑛、王桐令、孙伏园自北京南下，偕同西行。次朝，苍蝇哄鸣，扰人清梦，鲁迅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

夏元瑛过洛阳时，特访吴佩孚。吴问他在北大教什么课？夏答：“担任新物理中电子研究。”吴指壁上所悬八卦图，问：“此中亦有阴阳变化奥妙，能为我阐述否？”夏答：“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事。”吴说：“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事后，众闻夏谈及此事，笑。

鲁迅说：“这也是苍蝇之声耳。”

众问刘（静波）教何课。刘答：“研究国际间问题中的大国家主义。”

鲁迅说：“是帝国主义吧？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又有人问：“五四运动时，蔡子民（元培）先生在天安门宣布：‘只有洪水能消灭猛兽’，这些蝇营狗苟的琐屑，自当同时消灭否？”

鲁迅说：“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1976年7月17日回忆）

由于年月已久，时过境迁，以上点滴回忆，仅供研究鲁迅在这一时期活动之参考。

1924年12月，我应邀去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教授，为期一年。曾接受孙文的三民主义。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我不明其真相，乃失望而归。1925年11月至次年7月，我在苏州东吴大学兼课时，伪教育部长易培基电邀我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未就。1926年初任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次年任文学院院长。曾约请李达、邓初民等来院讲社会学，乃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后因CC派潘公展、复兴派吴兴亚等唆使三青团干涉校政，愤而辞职。其间，曾于1932年3月至7月，去广州办暨南大学临时分校并在中山大学兼课。1934年2月至7月短期失业在家。陈立夫曾约谈，因意见不合，不欢而退。同年8月，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1935年8月至1952年7月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1937年曾随校迁成都，后又随校迁回南京。1952年下半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以迄于今。

数十年来，我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印行的主要著作有：

《古书读校法》（1923年商务印书馆印）

《诸子书目》（1923年东南大学印）

《书目举要补正》（1927年金陵大学印）

《经学通论》上下卷（1923年东南大学印）

《诸子通谊》（1925年商务印书馆印）

《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中华书局印）

《中国韵文通论》包括：“《经》略论”、“论《楚辞》”、

“诗、骚之比较”、“论汉魏六朝赋”、“论乐府诗”、“汉魏及隋唐古诗”、“论唐人近体诗”、“唐五代及两宋诗词”、“金元以来南北曲”等九章。(1927年中华书局印)

《周秦文学》(1928年暨南大学印)

《汉魏六朝文学》(1929年商务印书馆印)

解放后，除编印《汉魏六朝散文选》等书籍外，参加文学艺术界重大问题的论争（如关于《琵琶记》问题的专题讨论等），撰写了各种论文，散见于各报刊。因为教学任务的需要，治学范围从最初的研究书目学，到诸子群经、文学批评史以及从先秦、两汉、隋、唐、五代到宋、金、元文学史，均广泛涉猎，写有专著。近二三十年侧重研究中国戏剧史，编写了中国戏剧史讲座教材，指导南京大学中文系历届戏剧研究生的学业。曾发表《元剧研究中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文学评论》1960.6期）、《关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1961.1.29文学遗产394期）、《关于〈西厢记〉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江海学刊》1960.2）、《再谈〈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1961.4.30文学遗产371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南开大学学报》1956.4期）、《从历史素材到〈赵氏孤儿〉杂剧》（《戏剧报》1961.15期）、《高明〈琵琶记〉评价的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南大学学报》）、《汤显祖〈牡丹亭〉简论》（《文学评论》1962.4期）、《关汉卿杂剧的民主性与局限性》（《光明日报》1965.8.22文学遗产521期）等有关戏剧方面的论文。其中《从隋唐大曲试探当时歌舞戏的形成》一文，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起源进行了新的探索。受业诸生，目前多在高等学校或社会科学院从事戏剧史方面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

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不算复杂。对我有影响或印象较深者略述如次。我父亲陈玉冠，教读私塾多年。叔父陈玉澍，盐域名孝廉，曾任本县尚志书院山长，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务长。著有《后乐堂诗文集》。平日自勉：“不受一自辱之钱，不作一近耻之事。”又以曾参“少讽诵、壮议论、老教诲”相勉。我自十岁至十五岁，从叔父读书，受他的影响至深。

数十年来，我在国内高等院校任教（除前述北京大学、北京女高师、广东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大学外，1930年还兼课于上海大夏大学，1937年兼课于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朝阳法学院），一般说来，师生之间情谊甚笃。同时得与蔡元培、陈独秀、邹鲁、郑洪年、邓初民、马哲民等相识。蔡元培氏主持北大，倡自由主义以及“六不主义”，我等颇受其影响。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曾办《新青年》杂志，思想激进。他曾一度入狱。后来与我通信，除讨论音韵、文字学而外，无其他内容。邹鲁为广东中山大学校长，我曾与之共事。他用人较放手，不干预琐事。郑洪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时，杨铨介绍我任该校文学院长。我曾约请许德珩、李达、邓初民为历史系讲授哲学。此举虽受高教司警告，我因持自由主义态度，未予理睬。郑后来在香港变节。邓初民氏曾最早介绍我读马列主义书籍。马哲民氏与我在暨南大学同事，他曾约我与李相符、沈志远诸人在成都合办《大学月刊》。回忆及此，感触颇多，那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

我还想提一提一位日本朋友——波多野太郎先生。我们互相知名，未曾谋面。多年来我们有书信往还。主要是学术交流。早在1933年前后，我还有幸访问过日本。那时我在上海